

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

张君勱民族建国思想评传

翁贺凯 著

法政思想
——
文丛

法政思想文丛。新的中国问题之视角。集汉语学界之学术力量。审慎研究中西政治与法律理论。

期冀开辟中国与西方传统政治的两种资源。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一般政治与法律原理。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

张君勱民族建国思想评传

翁贺凯 著

法政思想

文丛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勱民族建国思想
评传 / 翁贺凯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36-9489-9

I. 现… II. 翁… III. 张君勱(1887~1969)—思想评
论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8439 号

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
张君勱民族建国思想评传

翁贺凯 著

责任编辑 高 山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87×960 毫米 1/16

版本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张 24.5 字数 247 千

印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陶 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036-9489-9

定价:39.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谢 辞

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张灏先生。自2000年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投入张先生门下,算来已有整整六年的时间。最初,由于种种影响,我的学业进展得并不理想,张先生非常耐心和宽容地等待我逐渐进入“状态”。之后,在论文选题和初步的研究进路上,张先生依然给了我很大自由度,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适合自己学术背景的研究课题和方法。我在本科和硕士的基本训练是中国哲学和思想史,同时对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有一定的兴趣和研习,之所以选取张君勱作为我的博士课题,主因自然是不满意学界现有的研究,但我也确实存了“私心”:因为张君勱不仅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少数几个对于西方几大政治意识形态均有颇深“交涉”的人物,我希望在研究张君勱的同时,也能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理论兴趣和关怀。对此,张先生都抱持着一种开放和宽松的态度。不过,在论文的基本理论框架上,在最终的标准和质量上,张先生则是一点也不含糊和放松的,他反复叮嘱的是:不要急着动笔写,理论框架要先稳住,论文提纲要不断改。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一边做张君勱思想文献的研读笔记,一边读理论,思考并调整论文的理论框架,并在张先生的督导下两次修改了论文大纲;最后这一年的写作,虽然亦非一片坦途,但是基本都能按照预期顺利地展开和收结——现在回想起来,实颇多受益于张先生之前对我不断修改论文提纲的严格要求和指导。而最后这一年,亦正值张先生从科大荣休返回美国定居,张先生在忙乱的变动中、在身体一度抱恙的

情况下,陆续批阅了我寄去的论文,并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指导意见——现在论文中的部分章节和观点,便是在他的直接提点下写成或改订的。最后,张先生借赴台北中研院院士会议之机专程来到香港参加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并在答辩后和我详谈了论文修改和今后研究的一些建议。可以说,我的这部论文从酝酿、写作到完成,我应该把最浓厚的谢意献给张先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张先生的一些重要的批评和意见,在目前提交的这部论文中还没有得以反映出来,我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思考和回应张先生提出的问题。

我还要感谢论文委员会的另外两位成员——洪长泰教授和王心扬教授:洪老师讲授的史学理论,是我在科大受益颇大的一门课,他在张先生荣休这一年,作为我的执行导师,为我解决了不少学业和生活上的困难;王老师也一直关心我的学业和成长,作为论文委员会的主席,他为论文答辩的筹划费了不少心力。同样地,我也要感谢香港科大社会科学部的林益民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郑宗义教授,感谢以上几位老师在我的论文答辩中所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批评和修改意见。

这项论文研究得以顺利完成,离不开以下机构和人士的帮助:几年来,科大图书馆为我的研究提供了高效、优质的文献支援服务;科大人文学部两度资助我赴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图书馆从事资料收集工作;台北中华旅行社两次协助我赴台从事短期研究工作;张君勱先生的长女张敦华女士2004年12月在台北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录音访问,她还为我提供了不少珍贵的研究资料;对我的研究提供过文献支援和其他协助的还有:中国社科院近史所李洪岩先生、文学所张晖先生,北京大学法学院李贵连先生、黄章一先生,河北大学张振国先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潘光哲先生、文哲所江日新先生,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薛化元先生、政治学系孙善豪先生。

我也要借此表达我对家人的感激和歉疚之情。十几年来,父母一直尊重我的学术选择,并为我提供了持续的经济支持;为了专注学业,

科大六年间,我有四个春节没有回福州随侍父母,每周两次的电话,也成了我与父母沟通情感的主要方式。我在北京求学的几年间,养成了非常奢侈的“买书读”的习惯,南下科大时,甚至搬了千余本书到广州,把兄嫂并不宽敞的寓所变成了我的一个“后备图书馆”。哥哥还经常为我买书、送书,默默地支持着我的学业。

最后,要感谢一位特别的朋友。就在从事论文研究和写作这两三年间,我逐渐进入了古典音乐的世界,几乎在任何时候,那些奇妙的音符总能带给我慰藉和愉悦,它伴随和分享了我每一步的高低起落,现在,我也要把一份谢意送给这位忠实的朋友。

翁贺凯

2006年7月于香港科技大学

目 录

谢辞 / 1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一节 理论框架: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 / 2

一、民族主义:定义、渊源与特质 / 4

二、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兼论民族主义的类型学 / 11

三、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与民族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解释框架

——“放宽”与“收窄”的辩证调试 / 17

第二节 思想背景: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兴起和发展 / 21

一、中国民族主义在“转型时代”的兴起 / 21

二、民国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与走向 / 25

第三节 张君勱之生平与思想发展 / 30

一、早年(1887~1919) / 30

- 二、民族建国思想的初步成型(1919~1929) /34
- 三、民族建国思想的高峰与成熟(1929~1949) /40
- 四、晚年(1949~1969) /47
- 第四节 张君勱民族建国思想的基本架构：兼论本书之基本
结构与研究方法 /48
- 一、张君勱民族建国思想的基本架构 /49
- 二、本书的基本结构与研究方法 /56

第二章 宪政民主与民族建国 /59

引言 /59

第一节 张君勱宪政民主思想的起源

——以“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为中心的考察 /64

- 一、对民主制度的证成：论民主的保护性功能和教育性功能 /66
- 二、对代议制缺陷的认识和思考 /69
- 三、对实施宪政民主制度的条件的思考 /72
- 四、小结 /73

第二节 德国自由主义与魏玛宪政民主对于张君勱的影响

——以“法治国”观念为中心的探讨 /77

- 一、德国“法治国”思想的起源、发展及其与英国“法治”思想的
比较辨析 /78
- 二、魏玛德国“混合法治国”思想对张君勱的影响 /82

第三节 “修正的民主政治”辨析

——重访张君勱 20 世纪 30 年代的民主观念和制度设计 /90

- 一、“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提出及其国际与国内背景 /91
- 二、自由与权力的平衡——“修正的民主政治”的理论
基础 /94
- 三、“修正的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 /99
- 四、“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价值内涵和基本取向 /104
- 五、小结 /112

第四节 “人权为宪政之基本”

——张君勱宪政民主思想的成熟和稳固 /114

- 一、“人权”的基本内涵：“人权为宪政基本” /115
- 二、宪政的基本内涵：“国家为什么要宪法？” /119
- 三、对中国到宪政之路的思考：“吾国宪政何以至今没有确立？” /121
- 四、张君勱晚年宪政民主观略论 /124
- 总结：从当代政治与社会理论的新视角看张君勱宪政民主思想 /125

第三章 民主社会主义与民族建国 /131

引言 /131

第一节 “中国之前途，俄国乎，德国乎”

——五四激流中的民主社会主义选择 /133

- 一、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争：“中国之前途，俄国乎，德国乎？” /136
- 二、社会主义的内涵：“社会所有” /142
- 三、民主社会主义改造蓝图与伦理基础的初步奠定 /147

第二节 “国家社会主义下之计划经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社会主义思考 /155

- 一、国际与国内背景 /156
- 二、张君勱对于苏联“五年计划”之介绍与评论 /159
- 三、“国家社会主义下之计划经济” /162
- 四、比较与分析 /166

第三节 “社会主义之方向转变”

——战后与晚年的新思考 /171

- 一、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171
- 二、晚年：“社会主义之方向转变” /180
- 总结 /184

第四章 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建国 /187

引言 /187

第一节 在“大民族主义”的关怀之下

——论张君勱早年对于密尔民族理论之译介 /189

第二节 20 世纪 20 年代张君勱的文化民族主义观

——以“科玄论战”为中界点的考察 /196

一、科玄论战之前:“欧洲文化之危机与中国新文化之趋向” /197

二、科玄论战的“歧路” /203

三、科玄论战之后 /216

第三节 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

——张君劢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文化民族主义
思想论析 /224

一、“五千年历史中之中国及民族建国之觉悟”

——张君劢 30 年代“民族性”观念之演变与成熟 /224

二、“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

——张君劢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高峰 /237

第四节 “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

——晚年张君劢的民族文化观 /271

一、“现代世界的纷乱和儒家哲学的价值” /272

二、“自力更生中之多形结构” /278

三、“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 /281

四、小结 /286

总结 /287

第五章 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的中西思想背景与调和特质 /290

第一节 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的“现代”西方哲学背景 /290

第二节 张君劢思想的调和特质及其背景分析 /310

一、个人、社会、(民族)国家“相剂于平”

——张君劢调和的政治哲学观及其理论渊源 /311

二、张君劢调和的思想方法取向及其儒家思想背景 /320

第六章 结论: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

——张君劢的思想遗产 /330

一、“自由民族主义”:一个当代视角的启示 /330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张君劢:一个宏观的比较定位 /343

三、余论: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两个经典论旨的再思考 /356

参考资料/363

一、张君勱之相关论著与史料 /363

二、中文参考资料 /366

三、英文参考资料 /373

后记/377

“……张君劢先生的思想,也就是改造和重建中国的思想;他是这一百四五十年间思考中国出路问题贡献最大之一人……”

——胡秋原

CHAPTER 01 >>

第一章

导 论

张君劢(Carsun Chang, 1887 ~ 1969),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多重面向的重要人物:他毕生追求宪政民主,更因在《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和创制中的关键作用而被尊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他在五四后期肇端科玄论战,首倡“新宋学之复活”;晚年致力于儒家思想复兴的撰著和宣扬,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之一;他还是20世纪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代表之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批评者,20世纪30年代“国家社会党”、40年代“民主社会党”的党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的首要发起人之一,国共之间所谓“中间力量”(即“第三势力”)的领袖人物。

本书将透过“民族主义”——或者更明确地说,

“民族建国”^{〔1〕}的理论视角，去整体性地理解和展现张君勱一生多面向的思想追求和建构，因此，它也可以被视为一部张君勱的思想评传。

本章为全书的导论，将依次论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节，在概略检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我将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当代政治理论的视野中，对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民族主义的定义、渊源、特质以及基本类型学做一讨论和澄清；同时，我还将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基本状况作一概略的检视与讨论——借此，我也将陈明本书之所以选取民族主义作为张君勱思想研究框架的理论意识与标准所在。第二节，作为张君勱思想酝酿和产生的总体背景，我将对民族主义在中国“转型时代”（1895～1925）的兴起与发展作一铺陈。第三节，我将简述张君勱的生平与思想展开。第四节，我将分析张君勱民族建国思想的基本架构，暨介绍整篇论文的基本结构和本书此后各章的大致展开。最后，我还将略陈张君勱思想研究的难点所在和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取向。

第一节 理论框架：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

在学界现有的张君勱思想研究成果中，我以为台湾地区学者的两部著作——江勇振的《张君勱思想评述》（1975）和薛化元的《民主宪政

〔1〕“民族建国”（nation-building），中文学界还有称为民族国家建设、民族建设、国家建设或民族统一构设的。“民族建国”则是张君勱自己的用法，我以为也颇为妥帖，故采纳之。张君勱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就表现在他将中国建设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想，而张君勱有时即以“民族建国”来对译“nationalism”（民族主义），也恰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参考本章第四节的讨论。

与民族主义的辩证发展——张君勱思想研究》(1993)最值得我们注意。^[2]这两部不同时期的著作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颇富企图心地试图对张君勱一生的思想发展和追求作出整体性的解释;同时,它们的理论框架与中心观点,都“紧贴”其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最富吸引力的诠释模式——江著的主旨明显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论旨的影响,认为“寻求富强”的集体关怀导致张君勱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集体主义来接受和诠释西方自由主义,而薛著则基本不脱80年代后期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旨的主导,认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主导了张君勱思想的辩证发展。这两部著作的基本观点也被其后跟进的相关研究所广泛参鉴、借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张君勱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形象”。^[3]

我不能同意江、薛二著对于张君勱思想的诠释。我认为它们误解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张君勱思想中的关系。诚然,张君勱毕生思想追求的一条主线,就是如何将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为一个自主、富强、现代的民族国家——因此我们确实有充足的理由将民族主义作为透视张君勱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但是在张君勱的思想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在根本上,在绝大多数论述脉络下,并不是

[2] 美国学者金若杰(Roger B. Jeans)的张君勱研究用力也甚勤,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在史料的发掘和细节性的史实重构上;但他的研究在张君勱思想的总体理解和诠释方面着力不大。而中国内地的张君勱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逐渐涌现,大概是受到我国内地对“新儒学”研究课题的资助和90年代初期中国传统文化热潮的影响,所以它们较多从“新儒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视野受到一定的局限;而且这些论著较多参鉴了先行的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创意不多;同时仍然夹杂有不少“阶级分析法”的定见。由于我在全书以下各章节的具体论述中还会对相关研究作出评述,所以在此不再一一赘及。关于从“新儒学”视角透视张君勱思想的局限性,张汝伦已经有一个很好的阐释,参见张汝伦:“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张君勱”,载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2~525页。

[3] 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史华慈论旨的延续和发展,因此,薛化元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亦可以被视为对江勇振研究的延续和拓展。我在本书宪政民主章对于史华慈论旨的缺失以及江、薛二著基于史华慈论旨对于张君勱思想的误读,有更为具体的讨论和分析,请特别注意该章第一节。

矛盾、冲突的,有时甚至还是互相加强的。江、薛二著对于张君勱思想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对“民族主义”作了片面和狭隘的理解。^[4]一方面需要澄清这种误解;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之所以适于作为我们透视张君勱多面向的思想建构的基本框架,其实是与其本身的一些基本特质密切相关的;因此以下我们便非常有必要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当代政治理论的视野中,对民族主义的定义、渊源、特质和基本类型学作一讨论和澄清。

一、民族主义:定义、渊源与特质

与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名词概念一样,“民族主义”(Nationalism)充满了歧义性和复杂性。^[5]最一般地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将“民族(国家)”(Nation)作为忠诚的一个“焦点”(focus),并赋予民族成员共同的“认同”(identity,身份)与“尊严”(dignity)的集体感情。民族主义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独特形式——居于这一意识核心的,就是“民族”,它是一个蕴涵丰富的社会“映射”(image):基本上,它首先是指一个由众多拥有平等权利的成员所组成的主权实体——“民族国家”;它还可以是指一个具有共享历史与独特文化的共同体;也可以指一个源于(或自认为源于)同一祖先、血系的“族性群体”(ethnic group);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上述几种内涵(及其内涵下的子元素)的错综结合。可以说,“民

[4]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江、薛二人对于张君勱思想的误解部分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由主义”作出了狭隘的理解。同时,江、薛二人的误解与其理论支持——当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流论旨以及孕育这些论旨的西方学界的总体思想氛围——特别是“二战”之后二三十年间对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关系的片面理解,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无意抹杀上述这些研究论旨或诠释模式在当时的贡献,即使在今天,它们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是富有解释力的。但是我的研究至少令我确信:它们并不适合于张君勱思想的理解和诠释。

[5] “Nationalism”一词在中文还有国家主义、国民主义、邦国主义、族国主义、国族主义等不同译法——其中,我认为国族主义或族国主义的译法较能传达英文原词的神髓。不过,由于“民族主义”这个译名是如此的惯用,所以我还是采用这个约定俗成的译法;但是请切记,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表达的是“民族—国家主义”的实质性意义,请对照参见下注的解释。

族”内涵之丰富与不确定,是民族主义具有歧义性和复杂性的首要原因。^{〔6〕}此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集体情感,民族主义的内涵变化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从民族情感的来源上看,有可能是源于对本民族成就的自豪感,有可能是源于对民族未来的焦虑感,也有可能是源于受压迫的屈辱感;从对“外(人)”的态度上看,有可能是骄横侵略,有可能是猜疑排外,也有可能是积极自信;从民族忠诚的强度上看,有民族至上型,有平衡温和型,甚至还有世界主义型。^{〔7〕}

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8〕}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更在于:它已经不仅

〔6〕 Liah Greenfel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 王绍光:“民族主义与民主”,载王绍光,《安邦之道》,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87~105 页。由于篇幅所限,关于“nation”一词的演化和成型之过程,在此无法加以详加探讨,请参见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9 以及〔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9~131 页。需要强调的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 national state)在“nation”的内涵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正如浦薛凤所指:“nation”和“民族国家”的意义已经如此的密不可分,所以多数学者专门以“nationality”来指代“民族(性)”。参见浦薛凤编著:《现代西洋政治思潮》,正中书局 1963 年版,第 168 页。

〔7〕 参见王绍光:“民族主义与民主”。关于民族忠诚问题,有必要在此略加解释。无疑,民族主义都要求其人民的忠诚,不过,正如斯沃曼特所指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主义并不要求将民族作为个人忠诚的最重要或是唯一的焦点,只有所谓“整合式民族主义”(integral Nationalism)有这样的要求。参见 John Schwarzmantel, *The Age of Ideolog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35。更细致地来分析,上述王绍光对于民族忠诚的强弱状态的三种大致界分确是富有参考价值的:在一个极端,人们将对本民族的忠诚视为其最高使命,压倒所有其他的忠诚和公共义务,必要时甚至不惜为民族利益而作出最大的自我牺牲;在民族忠诚光谱的另一个极端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王绍光称为“普世主义”),其认为在道德上让民族忠诚超越其他一切价值是不能容忍的,其不否认民族忠诚的必要性,但是认为对于整个人类的责任是更加重要的;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是一种较为温和的立场——其仍然把对民族的忠诚放在对家族、地域、宗族或种族的忠诚前面,但并不认为民族忠诚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说,尽管强调民族忠诚的优先性,但是并不忽略对于人类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对于异族人民的责任和义务。

〔8〕 在此需要澄清本书对于“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解和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源于 18 世纪末洛克(John Locke)的一位不甚出名的法国门徒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所首用的“ideologie”,最初本是指一种描述内心中非为感官经验所形成的抽象观念起源的学习理论;意识形态与政治内涵的勾连,始于拿破仑用“意识形态家”一词攻击特拉西等知识分子在追求抽象真理时漠视历史事实,自居为改革与进步观念的支配者。意识形态的概念史迂回曲折,且与观念(尤其是政治观念)的角色争论结合在一起而变幻不定。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意

仅被视为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意识和集体情感,更被视为是一种“现代团体政治的总体状况的名称”(a name for the general condition of modern body politics),与现代国家构建和社会变迁的进程,紧密地勾连在一起。^[9]

就起源而言,以往西方学界的主流认识,基本是将民族主义视为现代性的产物,民族国家的形成、文化的世俗化,最终总是被归结为现代化(或者更直白地说,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功能性需要或条件。简言之,它认为:在现代性引发的“祛魅”(disenchantment)之后,以上帝信仰为中心的神学宇宙观及基督教共同体被瓦解,世俗生活需要“想象”或

(接上页)意识形态是指观念的社会决定因素或社会条件,也就是在团体生活与社会境况中思想的起源;马克思则将意识形态视为从属于经济基础的一种社会上层建筑;也有人认为意识形态是受不明的本能或非理性的动机所决定的思想或信仰。现当代学者多倾向在一种中性的意义上界定意识形态。沃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信仰的形态,这些信仰将规范性的见解导入政治生活中,形成一套关于理想秩序的见解,它通常包括对人性,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目标的认知等。斯沃曼特(John Schwarzmantel)则认为:意识形态由三大基本元素所构成——一套批评性的学说(critique)、目标(goal)和手段(agency);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是关于社会的总体转化和变迁的观念——相信社会和人性转化和改变是可能的、人可以转变为与新社会相匹配的合适的成员,这种观念为政治的辩论和行动提供了一种功能性的框架——而由于总体变迁只有在现代的视角之下才是可行的,亦只有通过人类理性的力量和转化的潜能方是可能的,所以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个深刻的现代概念。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正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后,意识形态逐渐走入了现代政治生活的中心。孕育现代意识形态的社会脉络(social context)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它们同时也就是现代意识形态所共享的议程(agenda),亦即“现代性的议程”:(1)对于自然资源的无限制的开发和工业化的不断增长;(2)民族国家的形成成为政治和文化的认同、为经济活动并为稍后的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征服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3)由于社会的工业化而生发的阶级分立和阶级政治。斯沃曼特认为:虽然面临后现代主义的强烈质疑,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意识形态来为民主的共同体提供了一个集体的目标,来为解放和“进步”——尽管它需要采取一种较启蒙运动时期更为谦和的姿态——提供一个宽广的指引;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来为政治辩论和行动提供框架,民主政治将陷于只关注个人或团体利益的追求和代表——亦即伯克(E. Burke)所谓“低水平关怀”、巴伯(B. Barber)所谓的“薄民主”的窘境。因此,意识形态、现代性政治,与当代社会仍然是相关的。我基本同意斯沃曼特的这一立场。参见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54-158; [美]沃特金斯:《意识形态的时代》,张明贵译,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2页; John Schwarzmantel, *The Age of Ideolog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5, pp. 63, 187-199。

[9]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London: Verso, 1981, p. 94.